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53 期（民國 95 年 9 月），1-5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考*

潘光哲**

摘要

梁啓超(1873-1929)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被後世視為闡釋「中國學術思想」的引路之作，具有首開風氣的示範意義。本文嘗試回歸這部書問世的原來場景，為梁啓超如何建構「中國」的「學術思想」的「知識」，提出歷史脈絡的考察。梁啓超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的書寫和詮釋，更深具提鍊「國族精神」(Volksgeist)的用心，為打造「國族精神」的認同工程，提供不可或缺的素質，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國族／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的具體表現樣態之一。

關鍵詞：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文化國族主義、「國族精神」、近代中國

---

* 本文爲國科會專題計畫：《「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晚清士人的閱讀世界(II)》（計畫編號：NSC92-2411-H-001-073）補助成果之一。又，本文初稿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辦，「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國家、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2005 年 10 月 13 日～15 日），與會期間得到林少陽博士的指教，復蒙汪榮祖、沈松僑、黃克武、沙培德、桑兵、羅志田、王晴佳與章清諸學界前輩友朋糾謬攻錯，謹此特致謝悃。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05 年 12 月 3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 年 5 月 4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　言

1912 年 11 月 10 日，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念書的胡適(1891-1962)，從報上看見了梁啓超(1873-1929)結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到中國受到熱烈歡迎的新聞，大爲感動，覺得「公道之尙在人心也」。因爲在胡適看來，梁啓超是：

> 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1]

就胡適個人來說，大發這般感懷，其實正是因爲他自己便曾深受梁啓超一桿健筆的恩澤。胡適回憶說，當他在 1905 年開始就讀於上海澄衷學堂的時候，梁啓超主持筆政的《新民叢報》便是他喜愛的課外讀物之一。梁啓超陸續發表在這份刊物上的《新民說》便讓他「震盪感動」不已，讓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同樣陸續發刊於《新民叢報》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2]也給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因爲它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的成果，它是「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的作品。那時才十五歲左右的胡適，深深著迷於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可惜，這部作品乃是梁啓超的未竟之業，胡適「眼巴巴的望了幾年」，總沒見著他把那些闕漏的部份給補上。胡適失望之餘，「自己忽發野心」，心想：

1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台 5 版）〕，冊 1，頁 122。

2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之七，頁 1-104（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台 2 版）〕；並參考《新民叢報》原刊本；又，本書另有更易書名的單行本：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3（台 9 版）〕。

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3]

在近現代中國學術的轉型歷程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 年出版，現行版本易名爲《中國古代哲學史》）是眾所公認的「典範」之作。[4]那麼，在它的孕育歷程裡，梁啓超的思想成果，顯然提供了相當的刺激作用。

從學術典範的形塑與傳承的角度而言，梁啓超的這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做爲他詮釋「中國學術思想」發展歷程的思想成果之一，給予後世的啓發意義，自是值得重視；然而，原來只是單篇論著的這部書，應該看成是梁啓超個人思想活動在特定時間定點上的具體展現，對探索梁啓超複雜多樣的「思想世界」來說，促成他動筆寫作的思想關懷，表現在這部書裡的思想內容，同時也是值得重視的。[5]本文之作，企圖從具體的歷史脈絡裡，細膩考查：梁啓超透過什麼樣的敘述架構，汲取哪些「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6]開展論說，從而爲「中國」的「學術思想」畫疆定界，並藉由勾勒出它的「變遷」趨勢，使得詮釋「中國」的「學術思想」的歷史遺產，可以提鍊出「國族精神」(Volksgeist)[7]的獨特性，在打造「國族精神」的認同工程裡，成爲不可或缺的

---

3 胡適，《四十自述》，《胡適作品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冊 1，頁 55-59。

4 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範轉移〉，《歷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168-174。

5 考察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專題論文，可以參見陳其泰、安靜波，〈20 世紀初梁啓超對中國學術思想演進的宏觀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4 期，頁 54-60；夏曉虹，〈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讀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天津社會科學》，2001 年第 5 期，頁 119-125。陳其泰與安靜波的作品，將梁啓超後期著述的意見，與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期的述論，合而述之，不免忽略時空轉換的意見差異；夏曉虹的作品，注意梁啓超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與其個人思想樣態的關係，也重視和日本學界的關聯，甚有啓益。

6 即如王汎森述說了從 1890 年代「戊戌」時期由日本導進的「思想資源」〔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爲例〉，《二十一世紀》，期 45（1998 年 2 月），頁 47-54〕，他的論述對筆者甚有啓發（不過，他並沒有處理本文探討的課題）；至若筆者從晚清閱讀史的角度述說「思想資源」的若干思考，參見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卷 16 期 3（2005 年 9 月），頁 137-170。

7 「國族精神」(Volksgeist)的述說，自然是以德意志浪漫主義(Romanticism)健將赫德(Johann G.

素質。以當前熾熱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討論架構來說，梁啓超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的書寫，正可視爲近代中國的文化國族／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8]的具體表現樣態之一，是書寫中國近代的國族認同史必須勾勒的一頁篇章。透過本文的考察，「以小見大」，亦可爲研究梁啓超的學術思想的取向，提供另一面向的思索。

二、1902年的梁啟超：「新民」的期待與「國族精神」的追尋

1. 梁啟超在1902年時的「思想世界」

梁啓超的生命史波瀾壯闊。從1890年代中期在中國思想／言論界嶄露頭角以來，梁啓超的生命／思想旅程，便堪稱是近現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一頁寫照；本文不擬詳述他的生命史全貌，僅就梁啓超於1902年開始著手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分的思想場景，略做勾勒，應有助於探討這部書

Herder, 1744-1803)爲參照點，相關述說眾矣，較新的綜合簡要論說，可以參見 Woodruff D. Smith, "Volksgeist," 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ed.,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5), vol. 6, pp. 2441-2443。

8 關於文化國族／民族主義的專題討論，不可勝數，舉其要者，漢語部份，如：楊思信，《文化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鄭師渠，〈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收入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頁260-279；英語部份，比較早期問世而以愛爾蘭爲例證的述說，見 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Gaelic Revival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John Hutchinson 對當下文化國族／民族主義探討領域裡甚囂塵上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等命題，亦有不滿：John Hutchinson, "Re-Interpreting Cultural Natio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45: 3 (1999), pp. 392-407；探討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歐美「跨洋」的文化國／民族主義者，如 W. M. Verhoeven, ed., *Revolutionary Histories: Transatlantic Cultural Nationalism, 1775-1815* (New York: Palgrave, 2002)；討論東亞者，如 Harumi Befu,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專論日本者，如 Kosaku Yoshino,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A Sociological E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2)、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2005）；專論印度（並導入「性別」與宗教等相關面向）者，如 Tanika Sarkar, *Hindu Wife, Hindu Nation: Community, 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C. Hurst, 2001)；蕭阿勤則以（主要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的情況開展討論：Hsiau A-Ch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餘例不詳舉。

問世的背景。

自從 1898 年「戊戌政變」之後，梁啓超被迫流亡日本，開始了以紙和筆做爲批判武器的歲月，先是創辦了《清議報》（1898 年 12 月 23 日創刊，1901 年 12 月 21 日出版第 100 期後停刊），《新民叢報》（半月刊）則是他在日本流亡歲月裡創辦的第二份刊物，始刊於 1902 年 2 月 8 日。[9]梁啓超以「中國之新民」爲筆名撰寫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就從 1902 年 3 月 10 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第 3 號開始與讀者見面。

「中國之新民」是梁啓超在《新民叢報》時期採用的諸多筆名裡最爲著名的。《新民叢報》第 1 號刊佈的〈本報告白〉即謂這分刊物的宗旨「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爲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蓋「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所以《新民叢報》便要「採合中西道德，以爲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爲智育之根本」，以餉讀者。[10]梁啓超筆走龍蛇，正是朝著這樣的方向，努力以進。

我們翻閱一下 1902 年時的各期《新民叢報》，便可發現，這是一分包羅萬象的刊物。即如《新民叢報》第 1 號的一個專欄名稱：「新智識之雜貨店」[11]一樣，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述說介紹的外國思潮、知識與人物，不可勝數。僅以梁啓超發表在《新民叢報》第 1 號的〈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爲例，這篇文章裡詳細述說的那些足可「聳動一世，餉遺後人」的西方學術名家，便是一分洋洋灑灑的名單。如他說「歌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提出「地圓之學說」，所以「瑪志侖」(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可以首先「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他指陳「倍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專倡格物之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則「倡窮理

---

9 關於梁啓超在日本創辦《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述說，參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2 版）〕，頁 199-211。

10 〈本報告白〉，《新民叢報》，號 1（1902 年 2 月 8 日），無頁碼；參考梁啓超，〈《新民叢報》章程〉，收入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上冊，頁 75-77。

11 〈雜俎・新智識之雜貨店〉，《新民叢報》，號 1（1902 年 2 月 8 日），頁 101-104。

之說」，他們的學說「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故這兩人實堪稱「近世史之母」；他又稱譽「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是「政法學天使」，「發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所以「政界一新」；提倡「天賦人權」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著有《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這部書則是「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至於「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的「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放紙鳶以驗電學之理」的「富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他們的研究則「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又如「亞丹斯密氏」(Adam Smith, 1723-1790)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後，「不徒學問界為之變動而已」，影響所及，「於人群之交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德國的「伯倫知理」(Johann K. Bluntschli, 1808-1881)，則堪稱「二十世紀之母」，因為他「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為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英國的「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創說「進化論」，「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讓人們知道「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的樣態，更讓人們明白「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的道理。梁啓超還舉出了在各學術領域裡頭角崢嶸的人物，都能以「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做出貢獻，這裡就不一一詳述了。[12]梁啓超也屢屢以專文在《新民叢報》的版面上介紹引述這些人物（及其他人物），[13]更為有心的讀書人，打開了無數的知識窗口。

梁啓超介紹的新知識，不僅是這些未見諸傳統中國經籍的人物而已，更還包括超逸出傳統中國學術門類的各式各樣的學術／知識體系。如他認為，「地理學」是「諸學科之基礎」，故特別撰寫〈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一文，述說地

12 中國之新民，〈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號 1，頁 69-77；收入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之六，頁 110-116。

13 參見本文附錄一：〈1902 年各期《新民叢報》以專文介紹的西方名人〉。

理學與文明發展的關係（《新民叢報》第 1 號）；從《新民叢報》第 7 號開始連載的〈生計學（即平准學）學說沿革小史〉，述說了經濟學的發展；〈政治學學理摭言〉（《新民叢報》第 15 號、第 18 號）則是對政治學理論的引介；關於（廣義）自然科學的歷史的述說，則見諸〈格致學沿革考略〉（《新民叢報》第 10 號、第 14 號）。除了引介新知識之外，對於中國傳統固有的學術門類，如史學，則成爲梁啓超抨擊的對象，他也從《新民叢報》第 1 號起發表〈新史學〉，痛斥傳統中國的史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14]批判的辭鋒，激烈之至。[15]凡此可見，梁啓超好似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書，爲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思想刺激。以當時積極追求新知而聲名並非稱顯赫的孫寶瑄(1874-1924)爲例，他看到了《新民叢報》後，即認爲梁啓超「學識」大有進步，所以這分刊物的議論「較前尤持平」，[16]即使他的朋友夏堅仲（生卒年不詳）自日本遊歷歸來，告訴他說《新民叢報》上讓中國人「讀之聳目驚心」的「新理」雖然連篇累幅，實皆拾取日本的「唾餘」，不足與之比肩，[17]

14 梁啓超，〈新史學〉，《新民叢報》，號 1，頁 41-44。

15 關於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之意義的探討，不可勝數，例見汪榮祖，〈梁啓超新史學試論〉，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冊 2，頁 955-968；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收入氏著，《聖賢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9-47；黃敏蘭，〈梁啓超《新史學》的真實意義及歷史學的誤解〉，《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219-235；黃克武，〈梁啓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181-213；餘不詳舉。

16 原文是：「梁卓如改《清議報》爲《新民叢報》，議論較前尤持平，蓋年來學識之進步也。」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二月二十日（1902 年 3 月 29 日）日記〉，氏著，《忘山廬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 580，頁 299；另，參考本書排印本：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492（因《續修四庫全書》爲原稿影印本，而排印本頗有錯漏，故本文徵引，悉據《續修四庫全書》本，另參考排印本；至於後者錯漏之處，不詳一一覈校）。

17 原文是：「梁任公《新民叢報》，新理盈篇累幅，我國人讀之聳目驚心，而自日人觀之，皆唾餘也，其程度相去懸遠。」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六月廿六日（1902 年 7 月 30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頁 378；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 549。

然而，《新民叢報》仍是孫寶瑄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之一，[18]他亦對梁啓超在日本「播騰」的「閎言偉論」，以及在中國「文字之中，闢無窮新世界」的功力，佩服之至，推崇爲與袁世凱(1859-1916)、盛宣懷(1844-1916)足可同稱並立的當代「奇人」。[19]

當然，梁啓超引述介紹的這些西方人物與學問，主要是他以日本爲媒介，汲取西洋近代思想的成果，[20]就他個人的認識／理解而言，未必能掌握其本來面目。即如他日後的自我批判曰，自己問學「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21]只是，相對而言，這樣的引介紹述過程，對梁

18 如孫寶瑄讀了梁啓超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新史學〉，雖覺梁啓超對於中國「舊史之弊」的論議「有未安之處，一時亦無以難之也」，但對梁啓超稱譽司馬遷等六位史學家「有創作之才」，則認爲「頗允當」。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七月八日（1902 年 8 月 12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頁 383-384；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 553；至於孫寶瑄閱讀《新民叢報》的其餘心得，不詳一一引述。

19 原文是：「今日支那有三大奇人：其一曰袁世凱。……其一曰盛宣懷。……其一曰梁啓超。梁一區區書生，當甲午、乙未之交，不過康門小徒耳。自充《時務報》主筆，議論風行，名震大江南北。戊戌政變，康、梁並出走，朝廷降懸賞名捕之諭，幾于通國人民皆聞其名，莫不震動而注視焉。然康自是匿跡銷聲，蟄伏海外；梁則棲身東島，高樹一幟，日積其怨氣熱腸，化爲閎言偉論，騰播於黃海內外、亞東三國之間，無論其所言爲精爲麤，爲正爲偏，而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啓超，非奇人而何？梁能於我國文字之中，闢無窮新世界，余故服之。」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八月一日（1902 年 9 月 2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頁 397；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 563；這番話應是孫寶瑄與嚴復（又陵）的談話心得。

20 關於梁啓超如何透過日本那裡汲取西洋近代思想，參見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本書有漢譯本：狹間直樹編，《梁啓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亦可參見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鄭匡民，《梁啓超啓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關於研討梁啓超與日本思想之關係的檢討，參見崔志海，〈梁啓超與日本：學術回顧與展望〉，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15-129。

21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148；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 1 編，冊 6。按，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撰於 1920 年，見梁啓超，〈自序〉（撰述繫年自署爲 1920 年 10 月 14 日）、〈第二自序〉（撰述繫年自署爲 1920 年 11 月 29 日），《清代學術概論》。

啓超本人的學術涵養與思想成長，其實也是甚有助益的，他吸收了各式各樣的「思想資源」，成爲他反思傳統中國文化的礎石。從這樣的脈絡來看，梁啓超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時候，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評價討論，和他當時對於西方文化的認識，有密切的關係，對於西方的認知／知識，構成了他理解／詮釋「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狀況(intellectual conditions)。因此，梁啓超評述的「中國學術思想」，無疑是以他當時對於西方文化的認知，做爲參照架構的。

2. 以「學術」而「新民」的目標所向

梁啓超以充滿感情的健筆引述介紹這些新知，更和他對於「新民」的期待，不可或分。在他看來，新民之道和學術尤其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指陳道，在這個「全地球激湍盤渦最劇最烈之場」的時候，「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苟不自新，何以獲存？」所以，「新之有道，必自學始」。因爲從近世西方的歷史來看，「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藝術、新器物；有之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22]他舉出足可「聳動一世，餉遺後人」的西方學術名家爲例證，述說「學術之勢力」如何「左右世界」，證明「智慧」與「學術」乃是「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用心所在，即是呼籲中國學者「見賢思齊」，要知道自己實有亦可「左右世界」、「左右一國」的力量。[23]「學術」乃是向「新民」之道前進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之一。

可是，梁啓超呼籲以「學術」而「新民」的最終目標所向，則是和當時如何避免中國「國亡族滅」的危機，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重振國族榮光的思索，密不可分。就當時中西競爭的格局而言，面對著歐風美雨的吹襲浴淋，中國好似節節敗退，文化學術領域裡「尊西崇新」的態勢，猶如洶濤拍岸，「文化危機」之局，更儼然銳不可當。[24]正如梁啓超本人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

22 梁啓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新民叢報》，號 1，頁 11。

23 梁啓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號 1，頁 69、77。

24 關於近代以來中國遭逢「文化危機」的綜合述說，可以參見余英時，〈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收入氏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勢》裡的觀察，在過去世界學術思想的歷史上，中國都處於「我中華第一也」的領先者地位，到了近代，則卻令人「汗顏」了。因此，藉著闡述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的價值與意義，使得能讓「一國之立於天地」的「特質」，得以被「淬勵之而增長之」，從而「喚起同胞之愛國心」，進而「恢復乃祖乃宗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25]理有必然。梁啓超對於確立中國在「文化的世界秩序」(the cultural world order)[26]裡原有核心地位的期望，更指向未來，他指陳道，如果「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那麼，本來就習慣於崇古爲尙的中國人，處於這樣的劣勢之下，便可能會表現出「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的心態。[27]「學術」與國族榮光的追尋和國族認同的建立，密不可分。

社會學者麥克孔(David McCrone)強調：「任何『國族』都必須有歷史，否則便無法成爲『想像的社群』」。他還引述了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警句：「沒有歷史的國族，乃是沒有肚臍的國族。」[28]在梁啓超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敘史裡，即特別彰顯中國「國族精神」之「特色」。如他聲言「無宗教」正是中國「特異於他國」之處，蓋「宗教」有阻於「學術思想之自由」，「害多而利少」，中國則因「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如佛教「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恆抱持其小乘之迷信」，而在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至於「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皆爲例證；[29]所以當周末之際處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的環境下，正因爲中國「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

頁 187-196。

25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2。

26 「文化的世界秩序」(the cultural world order)一辭，意指在全球層次上討論各種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ies)之間的互動的假設，引自 Jacinta O'Hagan, *Conceptualizing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pengler to Sai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 3。

27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2-3。

28 引自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2000 年 6 月），頁 84。

29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4。

學者遂得「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無礙」。[30]即使梁啓超論斷在隋唐之時爲「佛學」獨興時代，然中國「獨受大乘」，與其他亦深受佛教洗禮的文明地域大不相同，也是「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31]他更論斷曰，「中國之佛學」仍表現爲「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的特徵，蓋「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是以中國對佛教之承受「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相形之下，梁啓超以爲，基督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子之心」，故未可臻如「佛氏大盛」之境。[32]

國族主義論說之名家雷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早在1882年便提出敏銳的述說：遺忘歷史，乃至扭曲歷史，乃是創立國族的樞紐；歷史研究在學術上的進步，其實正會對國族意識帶來嚴重的威脅。[33]那麼，在梁啓超的筆下，他指陳「無宗教」做爲中國「特異於他國」之處，並以中國之接受佛教爲例證的見識，是否爲事實，是否允恰，並不重要，[34]反而正具體展現了梁啓超念茲在茲，實是從「學術思想」的闡釋，爲中國的「國族精神」畫疆定界，區分出與其他國家／民族／文化大不相同的獨特面向，以做爲建構國族認同的根基養分。所以，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提鍊的心血，提供給讀者的，固然可以是關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只是，這些「知識」背後的義蘊，其實是很「政治」的，是梁啓超的現實關懷的一種表現方式。

---

30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13。

31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74。

3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76。

33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trans. Martin Thom,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1.

34 其實，梁啓超本人（及晚清思想界）與佛學之間的思想關係，亦是錯綜複雜，本文不詳論，參看麻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卷下，頁121-134（本書亦述說了佛學在晚清思想界的整體樣態）。

三、「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空間」的生產方式

1. 構想和實現的落差

梁啓超最初開始動筆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時候，「雄心勃勃」，擬具了一整套的綱要，與這篇鴻著一起登諸《新民叢報》第 3 號。可惜，就像他許多曾有過的著作設想都未得完全實現一樣，最後問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全貌，與原來的寫作綱要，有很大的落差，列表如下所示：

寫作大綱[35]	問世章節	出處
一、總論 二、胚胎時代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胚胎時代	《新民叢報》，號3（1902年3月10日），頁41-56。
三、全盛時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未完）	《新民叢報》，號4（1902年3月24日），頁59-68。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續完）	《新民叢報》，號5（1902年4月8日），頁57-74。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甲）與希臘學派比較 （乙）與印度學派比較（闕）	《新民叢報》，號7（1902年5月8日），頁53-66。
四、儒學統一時代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第一節　其原因	《新民叢報》，號9（1902年6月6日），頁59-63。
	第二節　其歷史 第三節　其派別	《新民叢報》，號12（1902年7月19日），頁39-55。
	第四節　其結果	《新民叢報》，號16（1902年9月19日），頁51-57。
五、老學時代	第五章　老學時代	《新民叢報》，號18（1902年10月16日），頁57-64。
六、佛學時代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第三節　諸宗略紀	《新民叢報》，號21（1902年11月30日），頁35-50。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此節未完）	《新民叢報》，號22（1902年12月14日），頁25-31。

35 《新民叢報》，號 3（1902 年 3 月 10 日），頁 41；這分大綱只見諸《新民叢報》。

七、儒佛混合時代		
八、衰落時代	第八章　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 第一節　永歷【曆】康熙間（未完）	《新民叢報》，號53（1904年9月24日），頁45-60。
	第一節　〔永歷【曆】康熙間〕之續	《新民叢報》，號54（1904年9月24日），頁59-67。
	第二節　乾嘉間	《新民叢報》，號55（1904年10月9日），頁51-58。
	第三節　最近世	《新民叢報》，號58（1904年12月7日），頁21-34。
九、復興時代		
十、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十一、地理上之關係上（國內地理）		
十二、地理上之關係下（國外地理）		
十三、政治上之關係		
十四、文學上之關係		
十五、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十六、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由此觀之，梁啓超原來的構想，固然視野閎闊，終未完全落實。在他真正開始搖動筆桿的時候，思隨勢轉，具體的書寫成果亦有所變易。當《新民叢報》第22號（1902年12月14日出版）發表「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一節（且本節並未完篇）之後，《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寫作工程，竟因他隨後有美國之遊等因素，[36]遽然而止。一直要到近兩年之後的1904年9月，梁啓超方始重理舊業，開始動筆撰寫續篇，卻改變了早先的構想。他在寫作綱要裡以「衰落時代」來統攝「近二百五十年」的學術思想特徵，並聲言他執筆的「今

36　梁啓超於光緒廿九年正月廿三日（1903年2月20日）自日本橫濱啓程赴美，至十月廿三日（12月11日）始返抵橫濱，見吳天任編，《民國梁任公先生啓超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冊2，頁545、579。

日」乃「復興時代」，[37]此際則聲言自己原來以「衰落時代」和「復興時代」進行述說的「界說不甚分明」，並以「三百年來變遷最繁，而關係最切」的理由，遂乃先行撰寫以「明亡以迄今日」爲斷限的「近世之學術」部份，並表明等到這個部份完筆之後，關於「佛學時代」和「儒佛混合時代」，擬於他日再行「續補」，[38]卻從未履踐這樣的許諾。這樣，即令梁啓超曾經意欲以「儒佛混合時代」這個單元來述說宋、元、明三朝學術思想的發展，他的企圖，卻始終未可實現。因此，這部書欠缺了可以概括而言的「宋明理學」的述說，而「宋明理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的脈絡裡確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梁啓超則未可述及，實可謂這部書的一大缺失；梁啓超原來構想撰寫的第九單元以下的部份，更全告闕如，他對這些方面的思索成果，全無蹤影。因此，梁啓超意欲勾勒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歷史圖景，終非全璧，亦稱憾焉。

2. 闡釋「中國學術思想」的地理學視野

梁啓超原先構想撰寫這部書的大綱，則顯示了他當時的知識興趣之所至，既具體展現了他最初計劃勾勒「中國學術思想」的構想視角，也反映了他的知識視野面向的寬廣。

舉例而言，梁啓超構想撰寫這部書的時候，有意識地標舉出學術思想與「地理上之關係」，還計劃分成「國內地理」與「國外地理」兩個單元述論之，即可見得在梁啓超的「思想世界」裡，地理學的相關知識應有一席之地，是他的思想動力來源之一。特別是「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的思路，[39]一直是梁啓超清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利器，如他在 1901 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

---

37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

38 《新民叢報》，號 53（1904 年 9 月 24 日），頁 45；這些識語只見諸《新民叢報》。

39 關於「地理決定論」在梁啓超的「思想世界」與晚清知識界的情況，參看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49-70；Ishikawa Yoshihiro（石川禎浩），“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pp. 156-176。唐小兵則強調了地理學知識與梁啓超的國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參見 Xiaobing Tang, *Global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9-41。

裡便指陳「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40]的觀點。與撰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同時，梁啓超更連續發表了諸如〈地理與文明之關係〉（《新民叢報》第 1 號）、〈亞洲地理大勢論〉（《新民叢報》第 4 號）、〈中國地理大勢論〉（《新民叢報》第 6、8、9 號）、〈歐洲地理大勢論〉（《新民叢報》第 10 號）等好些與地理學知識相關的論述。[41]直至晚年，梁啓超對學術所受「地理上特別之影響」的思索，依舊不輟，〈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1924 年 2 月撰）一文，[42]便是又一代表作品。

就具體書寫而言，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即從「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爲「先秦學派大勢」區分出「北派」、「南派」之別，並列表對照兩派之差異，如「北派崇實際」、「南派崇虛想」等等，亦敘說兩派「中分天下」的諸般情態與個別的特徵，[43]爲「先秦學派」的整體樣態，揮灑出一片燦爛的勝景。

梁啓超的述說，儼然提出了可供學界參照的典範。約略同一時代的學人，如錢基博(1887-1957)撰〈中國輿地大勢論〉，也從地理角度著眼，將中國學界分爲「長江派」與「大河派」，論說長江派的「泰斗」是老聃，「大河派」的「鼻祖」是孔子，「中國學界之歷史」爲「儒老兩家相交戰之歷史」。[44]劉師培(1884-1919)則撰有《南北學派不同論》，倡言「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于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于北」，分別「諸子學」、「經學」、「理學」、「考證學」、「文學」諸端，開展釋論，[45]均堪稱爲與梁啓超同調的迴響。[46]時

---

40 梁啓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之六，頁 4；本文原刊：《清議報》，冊 90、91（1901 年 9 月 3、13 日）。

41 當然，梁啓超這些與地理學知識相涉的論述，頗有取材於日本學界方面的相關成果，如〈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一文，大抵即譯自日人浮田和民(1859-1945)的《史學通論》，參見蔣俊，〈梁啓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理論》〉，《文史哲》，1993 年第 5 期，頁 28-32。

42 梁啓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收入《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一，頁 48-81。

4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7-19。

44 金匱錢基博，〈中國輿地大勢論〉，《新民叢報》，號 66（1905 年 4 月 5 日），頁 54-63；按，錢基博的〈中國輿地大勢論〉初刊於《新民叢報》，號 64（1905 年 3 月 6 日），連載至《新民叢報》，號 67（1905 年 4 月 19 日）。

45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初刊：《國粹學報》，期 2、期 6 至期 7、期 9（1905 年 3 月

至今日，仍有學人從地緣面向，開展近代中國學術流派的探索，[47]亦可視爲踵步前賢之舉。凡此可見，對幅員廣大的中國而言，地域差異可以是考察學術流派變遷的一個重要視角。

3. 以「西」釋「中」的思想路向

整體而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當然提供了對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樣態的「知識」；只是，梁啓超對於西方的認知／知識，更構成了他生產這些「知識」的思想原料。「中」與「西」的對比參較，固然可以說是這部書的一大特色，更也凸顯了梁啓超以「西」釋「中」的思想路向。

像梁啓超在這部書的第三章第四節〈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裡，透過中國先秦學派與希臘學派的比較述說（不過，印度部份則付之闕如），既申述「先秦學派之所長」的五項特色，相對地，卻也指陳「先秦學派之所短」有六項：「論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物理實學之缺乏也」、「無抗論別擇之風也」、「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48]前二者全係以西方學術範疇爲評價標準；後四項缺失的揭露，則正反映了梁啓超當時「對思想自由的崇拜」的精神風貌，更與他追求「新民」的理想密切相關。[49]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狀態支配之下，梁啓超即以他當時吸收的西方知識面向，開展「中」與「西」對比參較的述說，更屢屢藉「西」而言「中」。例如，梁啓超說管仲整頓齊國，「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t)之形」；[50]他又在「先

---

25 日至 10 月 18 日），收入李妙根編，《劉師培論學論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頁 39-72。

46 參見夏曉虹，〈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讀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天津社會科學》，2001 年第 5 期，頁 125。

47 如中國廣州中山大學的桑兵教授之所爲，參見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收入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28-64。

48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3-38。

49 參見夏曉虹，〈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讀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天津社會科學》，2001 年第 5 期，頁 120-121。

50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21。

秦學派大勢」區分爲「北派」、「南派」的敘述裡，詮解說道「北派」之「政論」主張的是「干涉主義」，凡「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派」之「政論」主張的則是「放任主義」，並舉「干涉主義」和「放任主義」在「歐洲近世」的發展趨勢及代表家和人物來開展解說，進而既曰與孟子同時的許行的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相類」，又是「實放任主義之極端」。[51]至於漢代的《鹽鐵論》，是當時「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的紀錄，梁啓超認爲，比起「英國議院爭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52]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梨洲，1610-1695），著有《明夷待訪錄》，梁啓超認爲書裡的「原君、原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53]即可以和盧梭的《民約論》相提並論。凡此可見，在梁啓超的闡釋裡，往往以「西」做爲參照對比的要素，始可而言「中」之奧蘊。許行之理論的價值，可和柏拉圖或是社會主義或是干涉主義相類對等；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意義，則要以盧梭的《民約論》對比始可發其妙締。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這種「中」與「西」對比參照的述說風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之初學界同潤共享的。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諸《新民叢報》後未幾，即有署名「金七十論學者」致函梁啓超商討，論點甚眾，如他對許行的理論，即有異見：

> 許行為神農之言，而其所主持者，乃在君臣並耕，此與近世勞作私有權說，幾無二致，為社會學中一大宗派。……[54]

雙方對許行的詮釋，各有所見；而持以來自西方的概念／語言以開展述說的進路，則無軒輊。又如，就引證盧梭《民約論》來闡釋中國先哲著作的意義而言，在 1903 年的陰曆十月，劉師培與林獬（白水，1874-1926）纂輯《中國民約精

---

51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23。

5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43。

5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82。

54 金七十論學者，〈周末學術餘議〉，《新民叢報》，號 6（1902 年 4 月 22 日），頁 113-120；篇末有梁啓超所撰之「附識」。

義》[55]完成，引述各式各樣的傳統中國典籍來證明中國的「民主」傳統，表達了合群力、去人君以建共和政府的主張，[56]用心所在，更指向政治實踐的層域。凡此諸例，略可覘當時之風氣於一斑。

因此，梁啓超的論說和思想路向，正與時代風氣合拍，既是以「西」釋「中」的思維方式在歷史脈絡裡萌發的具體表徵，也展現了近現代中國思惟取向的一項重大特徵：對於「中國」的「學術思想」的闡釋，必須以「西方聖人」爲代言者，必須被納入西方的思想範疇，才可以被解釋清楚。[57]時換境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提供的「知識」，或許已被日後的學術研究成果汰洗換易；然而，這等以「西」釋「中」的思維方式，猶未必如明日黃花。

4. 在「西道中心論」陰影下的「知識」

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的闡釋，既然往往以「西」言「中」，推動他筆走龍蛇的思想素質，顯然便很難脫逃於「西道中心論」(Western logocentricity)[58]的「陷阱」。他關於中國民族的起源的述說，他以「科學」爲

---

55 劉師培、林獬，《中國民約精義》，收入劉師培著，《劉申叔先生遺書》，「中華民國廿三年寧武南氏校印廿五年印成」本〔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景印），1997）〕；他們在〈《中國民約精義》序〉中說：「吾國學子，知有民約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據楊氏廷棟所譯和本盧騷《民約論》以爲言。顧盧氏《民約論》於前世紀歐洲政界爲有力之著作，吾國得此，乃僅僅於學界增一新名詞，他者無有。而竺舊頑老，且以邪說目之，若以爲吾國聖賢從未有倡斯義者。暑天多暇，因搜國籍，得前聖曩哲言民約者若干篇，篇後加案證，以盧說攷其得失，……癸卯十月，以稿付鏡今主人……」〔〈《中國民約精義》序〉，頁1A（《劉申叔遺書》，總頁563）；此〈序〉繫年爲甲辰（1904年）四月〕。

56 如在引程子「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也」一段話的按語裡說：「欲行民約，必先合群力以保國家；欲保國家，必先合群力以去君主。蓋團體不固之民，未有能脫專制之禍者也。又《民約論》之論去人君之阻力也，謂必人人竭其能、盡之力，集合一氣，分之不散，誓盡去之而後已。則共和政府之成立，由於民之群聚，明矣。」〔劉師培、林獬，《中國民約精義》，卷2，頁12B-13A（《劉申叔遺書》，總頁583-584）〕。

57 筆者曾指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以是晚清時分用以鼓動革命風潮的「本土思想資源」，見潘光哲，〈追尋晚清中國「民主想像」的軌跡〉，收入劉青峰、岑國良主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論文集（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註78（頁163-164）；關於晚清思想界對黃宗羲的各種認知，另可參見朱維錚，〈晚清思想界的黃宗羲〉，收入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351-360。

58 “Western logocentricity”一辭，引自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標準進行學術評價的思維樣式，即是例證。

梁啓超說，中國種族都是「黃帝子孫」，可稱之曰「黃族」，而「黃族起於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寖昌寖熾，遂遍大陸」，[59]又說清代末年始發現的「龜甲文字」（即甲骨文）則可以做爲中國民族與「巴比倫同祖之一證」。[60]這些論述，首先既與清末知識分子如何將黃帝轉化成爲「中華民族」的始祖，爲二十世紀中國的國族認同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文化符號的趨勢，息息相關；[61]其次則與清末盛極一時的「中國民族／文化西來說」相唱和。大致而言，這個論說，初始於法裔學者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日本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撰《支那文明史》（1900 年出版）即取其說，是書漢譯本由東新譯社翻譯，改名《中國文明發達史》（1903 年出版），竟風行一時。其說大意略謂，西元前二十三世紀左右，原居西亞巴比倫等地一帶的巴克民族(Bak Sings)，在酋長奈亨臺(Kudur Nakhunti)率領下大舉東徙，輾轉入中國甘肅一帶，經長期征戰，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蠻土著部落，勢力伸入黃河流域，遂於此建國焉。奈亨臺，即中國古史傳說的黃帝；巴克，則乃《尙書》所言「百姓」之音轉。故謂遠古中國人種系出西亞。[62]這些論述，當時都在中國知識界得到熱烈迴響，普遍信以爲實，梁啓超亦不例外。

時至今日，「中國民族／文化西來說」固被否證，已無信徒；然而，宣稱中國人都是「黃帝／炎黃子孫」的論調，則尙喧騰不已，甚且深入人心。這樣的「知識」論述，在歷史的本來脈絡裡，其實只是那個特殊時空裡被編織出來的神話(myth)，然而，積蓄既久，竟儼然爲絕對真理。是以，如何從具體的歷史脈絡裡探索那些習以爲常的知識／觀念的形成史，提出更多元深層的反省，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

59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4。

60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03。

61 關於「黃帝」神話在晚清知識界的流傳及其意義，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28（1997 年 12 月），頁 1-77。

62 相關述說，參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期 28，頁 36-37；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世界書局，1934），頁 10-11；楊思信，〈拉克伯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及其在近代中國的反響〉，《中華文化論壇》，2003 年第 2 期，頁 141-146。

必然是跳脫既存意識形態束縛的起點。

同樣的，梁啓超提出「科學」做爲學術評價之標準的思維樣式，既展現了與時代合拍的特質，亦啓發後繼者踵步隨之。就時代風氣言，同代論者之崇尚「科學」的論說，甚囂塵上，如馬君武(1881-1940)論證「新學術」和「群治」的關係，歷數西方科學／科技成就，不免感慨言曰：

> ……西方以科學強國強種，吾國以無科學亡國亡種。嗚呼！科學之興，其期匪古。今以效西方講學之法，救祖國之陸沉，猶可為也。[63]

把「科學」與「國種」存亡命運之所繫，等同起來。「國粹派」要角之一的鄧實(1877-1951)在解釋發行《政藝通報》的理由時，亦聲言要「以科學定政論之標準」。[64]因是，梁啓超取「科學」爲清代學術之價值做出評判，提出「清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65]的評價述說，顯然正與時代思潮合聲呼應。這種奉「科學」爲尊，以「科學」爲學術評價語言的思維樣式，在此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裡，漸次獨霸至上。至日後 1910 年代末期，當「整理國故」的口號甚囂塵上之際，「賽先生」（科學）儼然成爲主導運動的無上綱領，[66]如毛子水(1893-1988)聲言「必須具有『科學的精神』的人」才有「研究國故」的資格，[67]傅斯年亦聲言「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非「抱殘守缺」者所能爲。[68]至如胡適更爲多樣地闡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如

---

63 馬君武，〈新學術與群治之關係〉，原刊《政法學報》，癸卯(1903)年期 3、期 7、期 8 連載，收入莫世祥編，《馬君武集(1900-1919)》（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198。

64 順德鄧實撰，〈論政治思想（一名政藝通報發行之趣意）〉，收入《光緒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 1，頁 1A-1B；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鄧實輯，《光緒癸卯（廿九[1903]年）政藝叢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28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總號 271，總頁 93-94。

65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87。

66 參見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收入氏著，《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17-254。

67 原文是：「倘若要研究國故，亦必須具有『科學的精神』的人，才能和上等醫生解剖屍體一樣，得了病理學上的好材料。不然，非特沒有益處，自己恐怕還要受著傳染病而死。至於究竟有幾個有『科學的精神』的人，應當去研究國故，是很容易從國故在今日世界學術上的位置知道的。」參見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原刊《新潮》，卷 1 號 5（1919 年 5 月），收入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劉季倫、薛化元、潘光哲編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⑤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頁 322。

68 傅斯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語〉，原刊《新潮》，卷 1 號 5（1919 年 5 月），收入張忠

何饒富「科學的精神」，[69]更是文史學研究耳熟能詳的論說。可以說，科學主義(scientism)在近代中國的旺盛生命力，梁啓超自有啓沃之功。[70]

從寬廣的歷史脈絡言之，這等將科學置於「文化權威」(cultural authority)的思路，在所謂「後進國家」普遍存在，顯示了西歐啓蒙時代以降追尋理性化與進步(rationality and progress)的心靈，也開始向非西方世界傳布，而科學之所以擁有這等「文化權威」的地位，正因爲它就是理性化與進步的正統象徵(the legitimating sign)。如果說，我們對於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提出當代社會的統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慧見，深有所感，那麼就別忘記了，當下我們得嚐受統理性這樣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權力形式」(pastoral form of power)的滋味，正乃是科學做爲一種「文化權威」在我們的具體歷史經驗裡形塑的結果。[71]

時至今日，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述說，開創的絕對不是百代不可移易的「知識空間」，歷經後繼者的智慧汰洗，它創生的「知識」，固然早已移形換樣，如「中國民族／文化西來說」早已成歷史；然而，它揭櫫的諸如以「西」釋「中」，獨尊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則猶薪傳不盡，襲衍未已。就省思日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樣態的「知識」生產活動／方式而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做爲這等「知識」生產活動／方式的「原始資本」，其間正積蓄著無限的奧秘。

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劉季倫、薛化元、潘光哲編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⑤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頁 331。

69 參見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1921 年 11 月 3 日撰）〉，收入氏著，《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卷 4，頁 205-246。

70 不過，郭穎頤討論近代中國科學主義的名著，並不特別重視梁啓超（與如「國粹派」等其他論者）在 1900 年代的「貢獻」。見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71 這裡的述說，參照 Gyan Prakash,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四、《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與梁啟超的思想構成樣態

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開創的是一方不確定的「知識空間」，然而，他究竟吸收了哪些「思想資源」，讓他得以動筆打造出這方「知識空間」，卻也值得揣摩思量。藉由觀察梁啓超的述論張本，並從歷史的角度來展示梁啓超的「思想世界」的動態面向，必然有助於解析他的思想構成樣態。

1. 梁啟超承襲的「思想資源」

梁啓超撰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際，即如他以日本爲媒介來汲取西洋近代思想一般，亦有借鑒日本學者如白河次郎、國府種德的《支那學術史綱》（1900 年出版）之處，[72]惟其承襲的「思想資源」，仍是豐富多樣，實未獨沾一味。大致而言，我們可以將梁啓超撰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吸收的「思想資源」，區分爲三個領域：一是傳統中國學者的意見，二是來自日本方面的助力，三是同時代學人的心得。

在引徵傳統中國學者的意見方面，如梁啓超在述說「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的段落裡，言及「社會之變遷」的影響，便引用了「顧亭林《日知錄》」。[73]就來自日本方面的助力而言，梁啓超自承「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他對佛學的論說，都取材自「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74]他亦以讀了「日本人木口長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學一書」，而對劉獻廷（繼莊，1648-1695）之「倡地文學」的貢獻，更有體認。[75]至於梁啓超吸收同時代學人的心得方面，引證（或辯駁）章炳麟（太炎，1869-1936）的論說，則更稱繁多。如對於王充（仲任，27-97？）的評論裡，

[72] 參見夏曉虹，〈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讀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天津社會科學》，2001 年第 5 期，頁 123-124。
[7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2。
[74]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72。
[75]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84。

他便說章炳麟將王的學說「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爲近矣」，[76]考察章炳麟的論說，此論見諸他的《訄書》重訂本；[77]梁啓超又說章炳麟極爲推許顏元（習齋，1635-1704），「以爲荀卿以後一人，其言或太過」，[78]這也是章炳麟《訄書》重訂本裡的意見。[79]至於清代「漢學」的「傳授派別」，梁啓超更明白承認「頗採章氏《訄書》而增補之，且自下斷案」；[80]至於其他引證章炳麟之論說的地方還有不少，不再一一詳述了。[81]

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亦占有一席之地的嚴復(1854-1921)，他的譯事工程，既被梁啓超稱譽爲「大蘇潤思想界」的努力，是讓中國「十年來思想之丕變」的第一功臣，[82]更也有助於梁啓超開展述說。像是梁啓超闡釋「中國學術思想」的「胚胎時代」，聲言由於「初民」因爲對於「地理之現象」和「空界之狀態」，遂而對「上天」產生了「種種之觀念」，便指陳曰：

> 「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83]

覆按嚴復之譯作，「初民」一辭應出自他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

> 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謂誅意者也。[84]

又如，梁啓超述說佛陀之生辰，亦依據嚴復而論斷：

---

76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52。

77 見諸章炳麟，〈學變第八〉，《訄書（重訂本）》；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重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 146-147；按，章炳麟的《訄書》有「初刻本」與「重訂本」兩種版本（《訄書》後來又修訂易名爲《檢論》，不贅），關於《訄書》「初刻本」的集結時間，學界論述不一，依據朱維錚的考證，應爲 1900 年 2 月中下旬到 4 月上旬之間，「重訂本」則於 1904 年夏曆四月在日本東京出版，見朱維錚，〈《訄書》發微〉，收入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頁 259-283。

78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83。

79 見章炳麟，〈顏學第十一〉，《訄書（重訂本）》；收入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重訂本》，頁 155。

80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93。

81 參見本文附錄三：〈梁啓超承襲章炳麟述說的對照〉；有趣的是，據說章炳麟曾稱許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曰：「真能洞見社會之沿革，種姓之蕃變者」（錢玄同，〈錢序〉，頁 3B，收入劉師培著，《劉申叔先生遺書》），亦可略窺被徵引者的反應於一斑。

82 原文是：「侯官嚴幾道復，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等書，大蘇潤思想界。十年來思想之丕變，嚴氏大有力焉。」參見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04。

8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6。

84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嚴譯名著叢刊」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 59。

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85]

更有趣的是，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還仰賴嚴復爲窗口，從而開拓自己的思想視野。梁啓超在這部書的〈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段落裡指出，「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如印度佛教諸大師相繼而起，希臘諸哲人交接而生，中國則諸子並起，百家爭鳴，「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86]這樣的述說，基本上乃是對嚴復的智慧，進行「再生產」的文字勞動。[87]兩相對比，雙方的論說，或略偶有出入，梁啓超承襲嚴復的睿識慧見的軌跡，歷歷可指；但是，文宗「桐城」的嚴復，絕無梁啓超生花妙筆的渲染鼓動之力，則也清晰可見。

從後見者的聰明來說，嚴復、梁啓超的觀察述說視野，亦且猶有「海外知音」，實頗近似於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提出的「軸心時代」(Axial Age, 800 to 200 BCE)理念。雅斯培認爲，在西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間，舊大陸的幾個主要文明：古代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都產生了思想與文化的革命性突破，各有代表性的哲人，軸心時代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堪稱孕育現代社會的溫床。[88]固然，嚴復、梁啓超與雅斯培的述論，粗精不可等量齊觀，關懷亦各有所趨，卻都展現了思想家要從（人類）文明的整體樣態，取鉅視觀點，開展對比參照的面向，進行文明特色之詮解的思想努力。[89]從這

85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0；覆按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見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頁 55-56。

86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0-31。

87 參見本文附錄二：〈梁啓超承襲嚴復述說的對照〉。

88 雅斯培的「軸心時代」理念，見諸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trans. by Michael Bullock（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漢語世界裡對「軸心時代」理念的論述，參見許倬雲，〈附錄：論雅斯培的樞軸時代的背景〉，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 125-155；張灝，〈世界人文傳統中的軸心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 1-26；其餘相關文獻，不詳引述。

89 如黃進興指陳，取比較研究的鉅視觀點，若運用得當，自可彌補細密具體研究「見樹不見林」

個角度而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想啓發價值，自有其獨特的魔力。

2. 梁啟超的「思想世界」的動態面向

梁啓超的「思想世界」，多樣複雜。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展現的思想樣態，恰只如豹之一斑，總該從特定的時空脈絡，也該從他的思想整體脈絡裡，即以「將理念脈絡化」(ideas in context)的取逕，進行理解，庶幾得其妙締。[90]

蓋就後設觀察視野，從具體歷史場景而言，這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述論，若視爲展現 1900 年代初期的中國思想界的一分史料，實是意義豐瞻。如梁啓超在這部書裡言及康有爲(1858-1927)的段落裡，長篇累牘地爲恩師辯駁，指稱「今後之學界，對於南海〔即康有爲〕，總當表謝意」，認爲康有爲「惠我以思想界之感化者」的功勞，「烏可忘也」，[91]正是當時思想界「批康」勢頭的具體反映。[92]又如，梁啓超對於清朝「二百年之學術」的評價，

之不足，亦可照顧同質研究的文化盲點，他推崇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中國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和相關著述，即具有相當的典範意義，參見黃進興，〈韋伯論中國的宗教：一個「比較研究」的典範〉，收入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45-75。

90 正如 M. Richter 指陳，英國的「劍橋學派」（或所謂「新政治思想史學派」）與德國的「概念史」(the history of concept/conceptual history【Begriffsgeschichte】)之研究，取向所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是以歷史的態度處理概念或是政治語言，也共同強調，不論是過去亦或現在的政治思想與行爲，都只有參照當事者在當時的特定脈絡裡所使用的獨特詞彙(vocabularies)，才能有所瞭解（參見 M.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4-142），Iain Hampsther-Monk 則踵 M. Richter 之後，再予分疏：Iain Hampsther-Monk, "Speech Acts, Languages or Conceptual History?"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istory of Concept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7-50。相關論述，不詳舉證。當然，關於英國的「劍橋學派」（或所謂「新政治思想史學派」），當然只是寬泛之說，其主要構成分子 Quentin Skinner、J. G. A. Pocock 與 John Dunn，他們的探討主題與研究取向，仍各有差別，綜述之作，可參看 Richard Tuck,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18-231。

91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00-102（引文見：頁 101）。

92 1903 至 1904 年間，思想界「批康」的情勢，章炳麟之〈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堪稱最受學界重

給予「總可命爲『古學復興時代』」的概念化述說，[93]即將西方的“Renaissance”時代爲標尺，用以比附／述說中國自身的學術思想的時代性格，甚或懸爲文化事業的理想目標，也是和同一時代的文化人同聲齊唱的具體表徵，[94]更直接影響了後繼者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對「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的評價。[95]就此而論，梁啓超的「一家之言」，既是特定時空脈絡的一頁思想寫真，也是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學界如何開展中國的學術思想之詮釋事業的思想串珠。

從探討梁啓超本人的思想軌跡來說，觀察比較他前後論說的異同，亦可一覘其變遷的樣貌。像是梁啓超對前行思想家的評價，屢有變遷，便是有趣的課題。例如，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相當稱頌呂留良(1629-1683)，譽爲順治康熙年間的「大儒」，因爲他是「茹種族之痛，處心積慮以志光復，

視，亦爲廣受眾知者，見章炳麟，〈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收入氏著，《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冊 4，頁 173-184；按，章炳麟此文撰於 1903 年 5 月〔據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64〕；無獨有偶，黃世仲（小配，1872-1912）以「禺山世次郎」之名在 1903 年 1 月的《中國日報》亦發表過《辨康有爲政見書》（見賴瓊、李巧玲，〈從《辨康有爲政見書》看黃世仲的政治思想〉，《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第 1 期，頁 95-98），然而卻未如章炳麟之作那般引人矚目。要言之，當時對康有爲的批判，顯然所在多有，如黃世仲後來更撰有小說《大馬扁》〔1908 年日本東京三光堂出版，據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221〕，對康有爲等大加譏彈；此題涉及廣泛，本文不擬詳論。

9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02-103（引文見頁 103）。

94 關於晚清民初的文化人對於「古學復興」／「文藝復興」的認知述說，可以參見王東杰，〈《國粹學報》與「古學復興」〉，《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頁 102-112；羅志田，〈溫故知新：民間的古學復興與官方的存古學堂〉，收入氏著，《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 83-142；羅志田，〈中國的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收入氏著，《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 53-90；李長林，〈歐洲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48。

95 胡適說：「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爲古學昌明的時代。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詁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纔勉強可以讀得。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西名 Renaissance，舊譯復興時代）。」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古代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再版）〕，頁 9；參考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台 5 版）〕，頁 8-9；至於在胡適的「思想世界」裡，如何屢屢以「文藝復興」這個概念來解釋中國文明的歷程與瞻望她的前景，整體歷程，錯綜複雜，亟待全盤的清理，簡單的釋論，參見潘光哲，〈「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胡適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文史哲學報》，期 56（2002 年 5 月），頁 123-124。

而歸本於以學術合群」，[96]此等評價，正是當時梁啓超尙懷有（某種程度）「種族之痛」心緒的具體寫照；待得後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裡，梁啓超則說呂留良與戴名世(1653-1713)不過只是受「文字獄」之禍的學者，「兩人都像不過是帖括家或古文家，不見得有很精深學問」，[97]不再盛譽之。前後評價的變化，也展現了梁啓超自身心靈世界的變易軌跡。又如，梁啓超對於荀子的評價，也漸有變遷。他在這部書裡批判荀子是「儒家中最狹隘者也」，甚至說「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98]至他以稍後回答「金七十論學者」提出的商榷裡，則稱譽曰：「荀學之取義宏博，綜理密微，誠中國之亞里斯多德也」，然對其「〈非十二子〉一篇，則期期以爲不可」。[99]及至 1920 年代問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00]與《儒家哲學》[101]（以及其他著述），如是激昂的批判之辭，已不復見矣。[102]

梁啓超對於戴震（東原，1723-1777）的評價，也有所變易，更顯示梁啓超隨時代思潮而立論的思想趨向。梁啓超在這部書裡，對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的評價不高，說他「極言無欲爲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焉」等等意見，只是老生常談，「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節之猶懼不誠，而豈復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爲也」，並指責戴震曰「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103]後來他在《清代學術概論》（1920 年撰）裡的評價，則大有變化，稱頌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是「三百年間最有價值

[96]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78-79。

[97]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台 11 版）〕，頁 173-175；按，本書始撰於 1923 年，翌年成書。

[98]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6。

[99] 見〈周末學術餘議〉篇末，梁啓超「附識」，《新民叢報》，號 6，頁 119-120。

[100] 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台 10 版）〕，〈自序〉繫年爲 1922 年 12 月 28 日。

[101] 梁啓超，《儒家哲學（1928 年清華大學講）》，收入《飲冰室專集（四）》〔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台 3 版）〕。

[102] 參見江心力，〈梁啓超「絀荀申孟」的荀學研究析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2 期，頁 47-51；關於晚清學界對荀子的不同認知，可以參見朱維錚，〈晚清漢學：「排荀」與「尊荀」〉，收入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頁 333-350。

[10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93。

之奇書」，他的「志願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戴震「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兩千年一大翻案」，[104]讚譽無已。迨 1923 年 10 月時，梁啟超更號召籌開戴震二百週年誕辰專門紀念會，為此撰寫了一篇〈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對戴震及其哲學備加推崇，後復撰有〈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等文，稱譽「戴東原先生為前清學者第一人，其考證學集一代大成，其哲學發二千年所未發」。[105]簡言之，近代以來關於戴震的研究討論，展現了多重涵義，梁啟超的思索，則與時代呼應。[106]

從歷史的和動態的角度來反思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正顯示了解析他的思想構成樣態的可能空間，實是無限寬廣。

五、結論：兼論研究梁啟超的學術思想的取向

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他表達現實關懷的一種方式，具體彰顯近代中國文化國族主義的表現樣態，還是他複雜多樣的「思想世界」的一個切面，明白展示了他當時的知識／思想狀況。梁啟超的生花妙筆，更激起長遠的迴響，對後繼者開展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啟發無限。

1.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長遠迴響

整體而言，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就像英年早逝的德國作曲家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的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Unfinished", D. 759)一樣，雖然「未完成」，卻是曲韻悠揚的大師手筆。他的述說，固有借鑒日本學界成果之處，惟其自我創獲之心得與表現，實開闡釋「中國學術思想」的新氣象，具有首開風氣的示範意義。從傳統中國學術史的

---

10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68-69。

105 參見陳祖武，〈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收入氏著，《清初學術思辯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329-330；陳祖武並指出，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對湯斌等人的批判，日後亦有改觀，不詳述。

106 參見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脈絡來看，過去那種基本上以學者思想家（或流派）爲單位，敘述學術思想變遷的各種「學案」（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等）的著述格局，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問世後，逐漸淡出；相對地，如它這種以章節形式的敘述體裁，論證區分各時代學術思想的特色，且結合或引證西方思想的趨勢以爲參較之依據的各種著作，日後相繼問世，蔚爲洪流，都成爲我們理解認識「中國學術思想」的憑藉。梁啓超突破既有著作格局，外加生花妙筆的勾勒，開創出簇新的「述學文體」，[107]在在都彰顯了這部書的「魅力」意義。

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出，迅即甚受矚目，像是以《新民叢報》爲「精神糧食」之一的孫寶瑄，涉讀之後，即深有感懷。如梁啓超述說道：「周公兼三王，作官禮」並加註語曰：

> 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一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群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為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毗而生迷因也。……[108]

孫寶瑄見得此論，回想起當年和梁啓超之間就此一課題的論爭場景，便頗覺欣慰，認爲梁啓超此論已跳脫康有爲師門之說的藩籬，立場既變，學識亦有進步；[109]孫寶瑄也很讚賞梁啓超將「先秦學派大勢」區分爲「北派」、「南派」，且謂「北派」主張「干涉主義」，「南派」主張「放任主義」的敘說，以爲「其

107 關於「述學文體」的述論，中國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有引路之功，參見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以「引經據典」爲中心〉，《文學評論》，2001 年第 4 期，頁 23-32、陳平原，〈精心結構與「明白清楚」——胡適述學文體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8（2002 年 12 月），頁 153-184、陳平原，〈「元氣淋漓」與「絕大文字」——梁啓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古今論衡》，期 9（2003 年 6 月），頁 3-22。

108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5。

109 原文是：「康門之學說，謂三代以前封建、井田、官禮制度，皆孔子一人捏造。以爲古時皆野蠻土番，安有此等文明。故六、七年前，梁任父與余反覆辨〔辯〕論非一次，皆堅持此說。余終不謂然。今觀其論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亦自變其說，謂周初爲胚胎時代，學術精神條理粗備之時，遂大書周公兼三王作官禮，且加注云：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蓋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是卓如竟自破其前說，足徵其學識之進。」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八月四日（1902 年 9 月 5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頁 399；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 564。

說頗圓」，是「近理」之說。[110]梁啓超對於呂不韋發動纂輯的《呂氏春秋》是「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的評價，[111]也爲孫寶瑄所接受。[112]又如錢玄同(1887-1939)則回憶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方始在《新民叢報》刊出，他便得到了捧讀的機會，成爲讓他「始知國學梗概」的著述之一。[113]凡此可見讀者對梁啓超的心血反應之一斑。[114]

就這部書在文化市場(cultural markets)上的流播樣態來說，梁啓超的筆耕所得，更會被輾轉複製，以其他的渠道／樣式流通。如「上海寶善齋主人」鄒王賓（生卒年不詳）即蒐集了刊於《新民叢報》第 9 號（1902 年 6 月 6 日出版）爲止的部份（即至「第四章・儒學統一時代」／第一節・其原因」爲止），以「任公」爲作者題名，篇名改題爲《中國學術史》，分爲五篇，編入他主持纂輯出版的《最新經世文編》裡，[115]儼然起了某種流傳作用，使得沒有機會讀到《新民叢報》的人，亦可藉此而得到一睹梁啓超的智慧心血的機會。日後，

---

110 原文是：「梁任父分我國古學曰南派、北派，北孔而南老。謂北重實踐，南重理想，其說頗圓。又謂北之有墨，南之有楊，皆走于兩端之極點，而立于正反對之地位。又謂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如盧梭放任主義，伯倫知理干涉主義；格蘭斯頓放任主義，比斯麥干涉主義），皆近理。」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八月四日（1902 年 9 月 5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頁 399-400；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 564-565；按，孫寶瑄這裡的摘鈔，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原文略有出入，如梁著原文是「北派崇實際」，「南派崇虛想」，至如其他不同處，不一一覈校。

111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25。

112 原文是：「秦相呂不韋，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飲冰稱爲千古類書之先河，一代思想之淵海。誠然。」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八月五日（1902 年 9 月 6 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頁 400；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 565；至於孫寶瑄閱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其餘心得，不詳一一引述。

113 原文是：「……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學及經學。然彼時對於學術思想之變遷，實茫無所知也。壬寅[1902]，讀梁君任公〔啓超〕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甲辰[1904]，讀章〔炳麟〕之《訄書》及劉君〔劉師培〕《攘書》，乙巳[1905]讀劉君之《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又讀夏君穗卿〔夏曾佑〕之《中國古代史》……，於是始知國學梗概。」參見錢玄同，〈序〉，頁 6B-7A，收入劉師培著，《劉申叔先生遺書》。

114 至於其他人物閱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反應，不詳一一引述。

115 見寶善齋編纂，《最新經世文編》，卷 101（頁 28A）——卷 102（頁 58A）；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寶善齋編纂，《最新經世文編》，130 卷，「光緒壬寅〔廿八(1902)〕嘉平月上海寶善齋石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景印本（12 冊）〕。

這部書更被改題爲《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史》（內文及版權頁又題作《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由上海群眾圖書公司於 1925 年 8 月出版單行本，至 1927 年 4 月已經 3 版問世，[116]後來則收入初步匯集梁啓超著述的《飲冰室合集》的「文集」部份（1936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117]且有更易書名爲《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單行本，在台灣長銷不輟，[118]時至二十一世紀，這部書仍以新式包裝在中國問世，[119]凡此可見，它在文化市場上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因是，這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固然是百餘年前的作品，它做爲梁啓超的「一家之言」，實是影響深遠。

2. 評價《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可能空間

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既然在文化市場上流播無已，它提供關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樣態的「知識」，遂乃積存綿衍，進而形塑了我們日常生活的認知架構，打造了我們視爲理所當然的世界觀。只是，時變境易，從後來者的知識視野而言，梁啓超開啓的「知識空間」，固然應當還有相當的借鑒意義，卻不該未經反思地「照單全收」。

整體而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當然提供了對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樣態的「知識」；不過，梁啓超對於若干思想／人物的定位與解說，則未必公允恰當，頗可商榷。研治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大家蕭公權(1897-1981)即認爲，管子之「以法治國」仍是「人治思想」之一種，實不可與西方「法治」理論相提並論，[120]辨析甚精；梁啓超論述曰齊國在管仲整頓之下「成一『法治國』(Rechtsstat)之形」，恐爲皮相之論，實瞠乎其後也。至如梁啓超勾勒的歷

---

116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哲學・心理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頁 46。

117 關於《飲冰室合集》的出版之經緯，參見夏曉虹，〈《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序〉，頁 1，收入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

118 如本文註 2 所示，更易書名爲《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單行本，至 1973 年已是「台 9 版」（此後版次不詳），可見它在台灣的文化市場上，始終暢銷不衰。

119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列爲《蓬萊閣叢書》之一，由夏曉虹撰寫導讀。

120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217-218。

史變遷樣態，也難免會是信筆潑墨的粗疏圖景，如他申述兩漢的「儒學統一時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進步「自茲凝滯」的轉捩點，更是「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121]梁啓超的觀點，固然自成一說；不過，他的述說，卻是對複雜的歷史事實，過於簡化的成果。梁啓超將「儒學統一」的「確立時代」定於漢武帝一朝：

> 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玆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122]

可是，「罷黜百家」不能被解釋爲禁止或是禁絕其他學派的流傳講學著述等活動；而且，就董仲舒對策的內容看，「罷黜百家」的意思，指的是他主張朝廷對於並非修治儒學而被舉爲賢良的人，不予錄用，令其歸去；而非專治儒學的，也不能被用爲博士，或錄爲博士弟子。梁啓超說：「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但是，即便是在兩漢時期，儒學以外的各家也一直有人研究，一直在活動。[123]梁啓超論述曰：「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124]實過於武斷。對比於後繼學人的智慧，梁啓超創造的「知識」，顯然不會是永恆的絕對真理。

況且，梁啓超書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關懷，既同打造近代中國的國族認同，不可或分；他闡釋「學術思想」的地理學視野，究其底蘊，自亦沾染相類的釆色。就像其他現代學科(discipline)一樣，地理學和國族認同的創造，實是關係密切。[125]然而，從「後設地理學」(metageography)[126]的認知

121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9。
12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44。
123 參見劉桂生，〈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及其成因〉，收入氏著，《劉桂生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頁 3-28；當然，即如劉桂生的述說，與梁啓超同時代的學人如劉師培等，亦有相類的見解。
124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8-39。
125 參見 Davi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本書收文 23 篇，除了討論主要英法等歐洲民族國家的情況外，如紐西蘭的毛利族(Maori)、太平洋群島或阿根廷等民族或國家的情況，亦有涉及，饒富興味（至如相關文獻亦眾，不詳引述）。
126 「後設地理學」意指讓人們藉以安排自身關於世界的知識之空間結構的機制(the set of spatial

來說，我們進行學術研究或知識生產活動的時候，既存的民族國家統攝的地理空間，爲什麼竟然好似不證自明的觀察視野，實在是值得進一步思索的問題。就歷史研究與書寫的對象而言，以既存的現代民族國家（如英國、法國）爲主題撰述的各種「國史」(national histories)，既與國族(the nation)的締造過程，緊密相連，也帶來了「史學的政治化」(the politic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的結果。[127]在後殖民史學(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興起的背景下，這等「國史」，則已廣受質疑，理由很簡單：它接受了現代民族國家對其領土空間的宣示，把國族當成歷史書寫普遍範疇，同時也確立了民族國家這樣的政治／經濟形構(formations)是構成世界的基本單位。然而，所謂的「民族國家」內部豈是鐵板一塊：各區域、各民（種）族之間的差異，其實也是複雜之至。惟則，「國史」既然強調某一民族國家的一致性，這些差異就往往會被泯滅，從而忽略了人類社會在歷史舞台上各種錯綜複雜的表現形式。[128]就以針對某一特定國族內部提出的地理差異論述來說，可能形成的認同，應該是有不同層域的。以法國內部流傳已久的「兩個法蘭西」(the “two France”)論述爲例，正展現了國族認同述說（及其現實意義）的多樣面向。所謂「兩個法蘭西」係杜賓(Charles Dupin, 1784-1873)在 1826 年提出的論述，以 Genera 到 Saint-Malo 劃分南北界線，線的北方，32 個省(départements)，1,300 萬人；線的南方，44 個省，1,800 萬人。線北有 70 餘萬學生，線南只有 37 萬名學生。從下一代學生的人口比例差距，

structures)，是不自覺地用以組織關於歷史、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甚至於自然史研究的架構(frameworks)。參見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27 參見 Stefan Berger with Mark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in idem.,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6；按，此書綜合英、法、德、義四國在十九世紀以來的史學民族主義(historiographic nationalism)而論。

128 這是 Christopher L. Hill 的思考，他以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美國史家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以及十九世紀法國自由派經濟學家 Paul Leroy-Beaulieu 爲考察對象，提出了這樣的論述。參見 Christopher L. Hill, “National Histories and Word Systems: Writing Japa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Q. Edward Wang, Georg G. Iggers, ed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pp. 163-184。

他提出了北方是「已被啓蒙的法蘭西」("enlightened France")，南方是「黑暗的法蘭西」("dark France")的觀點，而各式各樣的其他數字證據，如農工產品總值、每人平均收入、公共稅收等等，也證明了以這條線來劃分「兩個法蘭西」的「正確」，此後，甚至於結婚／生育比率、平均犯罪率等等統計數字，均可用以驗證論說「兩個法蘭西」的「實情」，藉此而營構的社會改革工程(social reform engineering)，亦別有所趨（當然，知識／權力的斧鑿痕跡，則是斑斑在目）。[129]因是，在闡釋學術思想的「知識」生產活動裡，就算是注意到地域空間差異和學術流派變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這等「知識」的內容，所可打造形塑的認同象徵／意義，絕對不會是單一面向的。

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企圖從「學術思想」的闡釋，爲中國的「國族精神」畫疆定界，在他筆下的「中國」，儼然便是渾然天成，不證自明的整體。從理論的思索來說，各式各樣的國族意識形態策略(nationalist ideological strategies)往往會嘗試全盤改變既存文化符碼的論述脈絡(the discursive context of existing cultural code)，從而創造出新的意義，以確證國族乃是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文化範疇(nations as a legitimate cultural category)。[130]就具體的人類歷史經驗而言，視民族國家爲整體，進行歷史文化傳統的詮解，自然便會刻意凸顯自身的「特色」所在，像是美國學界高唱「美國例外論」(exceptionalism)的聲調，亦曾甚囂塵上。這一論說在 1920 年代興起，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竟一度成爲美國史學界的核心辭彙之一。就歷史面向而言，它是對馬克思主義論說世界資本主義必將崩潰這一條「規律」的反動；然而，在宏觀的歷史脈絡言之，那種倡說「例外論」的歷史著作，仍可從美國自身的文化土壤裡找到種子，抗議教傳統(Protestantism)和共和論(republicanism)就是其主要元素。就前者言，來到新大陸的抗議教徒，自視爲上帝唯一的選民；就後者言，

---

129 其間詳情，曲折變化多樣，未可詳述，參見 Roger Chartier, "The Saint-Malo-Geneva Line," in Pierre Nora, ed.,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vol. I, pp. 467-496。

130 Anshuman A. Mondal,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India and Egyp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27.

美國獨立革命並不像歐洲大陸的革命那樣帶來血腥暴力，在美國的革命裡，沒有羅伯斯庇爾(M. F. M. Isidore de Robespierre, 1758-1794)這樣的人物，相反地，創造的成果是史無前例的共和國。只是，隨著現實的變化，特別是 1990 年代末期共產主義集團的崩解，人們對所謂的「規律」的認識，大有不同。這種「規律」，其實不過只是想像的產物而已，既無「規律」，焉有「例外」？即使近今仍有學者高揚「美國例外論」之大纛，如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的 Terrible Honesty: Mongrel Manhattan in the 1920s（1995 年出版）便宣稱：「我相信……在西方的發展裡，美國是個特例(a special case)」；但是，這等「美國例外論」的論說，已然遭受相當的挑戰。[131]

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透過「學術思想」的闡釋，重行建構既存的文化符碼（如先秦諸子）的意義，拈出中國與其他國家／民族／文化大不相同的獨特面向，以做爲建構國族認同的根基養分，既與這等書寫「國史」的普世風潮，合拍共應，亦或頗有可和「美國例外論」類比的意味，實在堪稱近代中國文化國族主義的具體例證之一。流風所及，各種詮解「中國學術思想」的著述陸續登台面世，更都踵隨梁啓超同調而行，都以不證自明的「中國」做爲學術研究或知識生產活動的對象。

可是，後繼者開展關於（不證自明的）「中國」的學術研究或知識生產活動之際，即令各有勝義，新說頻出，往往卻都難可掙脫梁啓超往昔以「西」釋「中」的思想路向，《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做爲這等「知識」生產活動／方式的「原始資本」，孳生傳承，曾無已時。即如日後開拓「中國哲學史」學科有領首之功的胡適，自稱要以「西洋的哲學」做爲「比較參證的材料」，使中國古代「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在他看來，只有「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方能夠「貫通整理中

131 參見 Daniel T. Rodgers, "Exceptionalism," in Anthony Molho and Gordon S. Wood, eds., *Imagined Histories: American 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40（Ann Douglas 的話，引自 p. 35，出處見該文註 54 [p. 40]）。

國哲學史的史料」。[132]承繼而起的馮友蘭(1895-1990)，書寫《中國哲學史》，也開宗明義地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133]胡適和馮友蘭的這兩部「中國哲學史」，各有其時代特色和學術貢獻，[134]影響深遠，卻都站在以「西方哲學」來詮釋「中國哲學」的共同思想立場上。印度學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討論後進國家的國族主義運動必然面對的矛盾，指陳曰，西方近代國族主義標榜普遍性意義的知識架構，以超越各文化之畛域相號召。可是，後進國家的國族主義者在接受這套知識架構時，同時也默認了伴之俱至的西方「現代性」諸價值的普遍適用性；惟則，國族主義的核心信念卻又強調每個「民族」歷史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獨特性。因此，這些國族主義知識分子不能不既接受又反對這套來自異文化的知識與道德上的宰制，長期擺盪於「現代性」與「本土傳統」之間，徘徊躊躇，莫之能決。[135]查特吉的理論視野，正提醒我們，觀察反省近現代各種「中國」的「學術思想」變遷樣態的「知識」的生產活動／方式的時候，最好注意它們是否共享分潤相同的思想立場，都將來自西方近代的知識架構，視爲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範疇。[136]《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做爲引生風潮的首創系統之作，傳衍至今，竟致這等以「西」釋「中」的思想路向，好似沛然莫之能禦，當代學人從如「後殖民批評」(postcolonial criticism)這樣的激進觀點來評價它，指陳中國學術傳統的

132 原文是：「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於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我們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古代哲學史》，頁 31-32。

13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增訂 8 版）〕，頁 1-32；按，本書初版於 1934 年，見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142。

134 相關的比較述論，參見翟志成，〈師不必賢於弟子——論胡適和馮友蘭的兩本中國哲學史〉，《新史學》，卷 15 期 3（2004 年 9 月），頁 101-145。

135 引自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期 3（2002 年 12 月），頁 86。

136 即如中國學者方朝暉的論說，中國與西方的思維方式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他進而批判中國人用西方現代學術的範疇和標準來衡量一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成果。見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建構與詮釋，居然承受了西方知識／思想的「陰影」的籠罩和支配，[137]雖是理據堂皇，批判者揮舞的理論武器，則依然無所脫逃於「西」之外。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梁啓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既是近代中國文化國族主義的一分具體文本，也可以是後來者汲取「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的重要依據之一，更深具省思這等「知識」生產活動／方式的「原始資本」的意義。因此，在研究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領域裡，它提供的思想動力，實在生生不息，後繼者可以開展評價的可能空間，更是無限廣袤。

3. 開展研究梁啟超的學術思想的恰當取向

像梁啓超這樣一位在近現代中國史上聲名洋溢而且影響巨大的人物，關於他的生平歷程與貢獻所在的研究思考，繁多難數。早在三十餘年前，江勇振檢討當時已然問世的「梁啓超研究」的成果便已指出，應該多方面的拓展「梁啓超研究」的方向。例如，他認爲，探尋學術思想方面的梁啓超形象，亟待開展，[138]誠哉是論。只是，以梁啓超在學術思想史領域的思想活動爲主題，進行研究探索的時候，實在需要審慎以對，「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在不同的時空裡，梁

137 劉人鵬即引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的這段述說：「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也是；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頁 4），與梁啓超的其他言論，從後殖民批評的角度開展析論（與批判），見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收入氏著，《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頁 132-154。

138 江勇振，〈期待另一個研究梁啓超的新方向〉，原刊《〔師大〕歷史學報》，期 2（1974 年 2 月），收入史華慈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頁 239-263。按，江氏此文係針對以下諸書提出評論：

(1)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nd edition])；

(2)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初版）〕；

(3)Chang Hao（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Philip C. Huang（黃宗智）,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啓超對同一主題的詮釋意見，可能差異甚大，如果僅是「弱水三千，單取一瓢飲」，逕只摘取梁啓超在某一特定時空之際的意見，視之爲他對某一主題的定論，進而開展述說，恐怕只會讓學術思想方面的梁啓超的形象被「平面化」，[139] 更未可端詳他思想變化的動態軌跡。[140]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身爲後繼者，當然可以從多元的理論關懷面向，開展《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評價工程。不過，理論層域的激進批判是一回事，歷史本來樣態的認識，又是另一回事。畢竟，透過這部書來思索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敘述架構，是在什麼樣具體的歷史情境裡被建立起來的，必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反省與思考，那些好像已然習以爲常的學術體系、知識架構或是思想觀念，其實未必理所當然，不該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只是，要開展這樣的「顛覆」工作，它的起點，就應該是把這部書還原到它誕生問世的歷史脈絡裡，注意它的作者：梁啓超動筆寫作的時候，有那些成分與要素縈迴在他的「思想世界」裡，仔細解剖他的論述依據，詳密觀察他開展述說的參照架構，思索他的寫作用意，也將他的理念／述說「脈絡化」，既與梁啓超本人在不同時空下的述說變化交互對照，也對比同一時代／下一世代的知識人的相關論述，以彰顯其特色。透過這樣的閱讀／理解過程，我們能夠得到的，既是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如何被生產出來的認知視野，也可以藉著這部書來思索近代中國的文化國族主義的歷史遺產，還更可以深化對於梁啓超個人學術思想面向的理解。對關心中國近／現代思想與「梁啓超研究」的學界同好而言，本文之作，「野人獻曝」，希望略具這樣的提醒作用。

---

139 例如，易新鼎的《梁啓超和中國學術思想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的描摹，即頗有此弊。

140 相形之下，黃克武關於梁啓超的學術思想的研究成果，即突破既有格局，甚有創獲，參見黃克武，〈梁啓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爲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6（1996年12月），頁41-90；黃克武，〈梁啓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0（1998年12月），頁101-148。

附錄一：〈1902 年各期《新民叢報》以專文介紹的西方名人〉

篇名	《新民叢報》出處	說明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	號1～2（1902年2月8日、22日）	介紹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與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	號3（1902年3月10日）	介紹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號4～5（1902年3月24日、4月8日）	介紹孟德斯鳩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號4、6～7（1902年3月24日、4月22日、5月8日）	介紹噶蘇士 (Louis Kossuth, 1802-1894)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號9～10（1902年6月6日、20日）、號14～17（1902年6月6日～10月2日）、號19（1902年10月31日）、號22（1902年12月14日）	介紹馬志尼 (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新民叢報》誤爲 Ginseppe Mazzini】、加里波底 (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與喀富爾(Camillo Benso di Cavour, 1810-1861)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號15～16（1902年9月2日、16日）	介紹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新民叢報》誤爲 JeremY Bentham】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號17～18（1902年10月2日、16日）	介紹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1754-1793)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號18（1902年10月16日）	介紹頡德 (Benjamin Kidd, 1858-1916)【《新民叢報》誤爲Ben Jaman Kidd；《新民叢報》文末註記曰「未完」，但未見續篇】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號20～21（1902年11月14日、30日）	介紹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新民叢報》第21號文末註記曰「未完」，但未見續篇】

附錄二：〈梁啟超承襲嚴復述說的對照〉

嚴復[141]	梁啓超[142]
世運之說，豈不然哉。合全地而論之，民智之開，莫盛於春秋戰國之際：中土則孔墨老莊孟荀，以及戰國諸子，尙論者或謂其皆有聖人之才。而泰西則有希臘諸智者。印度則有佛。佛生卒年月，迄今無定說。……。今年太歲在丁酉，去之二千八百六十五年，佛先耶穌生九百六十八年也。……。佛成道當在定、哀間，與宣聖爲並世。豈夜明諸異，與佛書所謂六種震動，光照十方國土者同物歟？魯與摩揭提東亞里差，僅三十餘度，相去一時許，同時睹異，容或有之。至於希臘理家，德黎稱首，生魯釐二十四年，德，首定黃赤大距、逆策日食者也。亞諾芝曼德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斯生魯宣間。畢，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芝諾芬尼生魯文七年，創名學。巴彌匿智生魯昭六年。般刺密諦生魯定十年。額拉吉來圖生魯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薩哥拉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摩頡利圖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質點之說。蘇格拉第生周元王八年，專言性理道德者也。亞里大各一名柏拉圖，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號。亞里斯大德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學未出以前，其爲西人所崇信，無異中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你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巨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你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拍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闍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Thales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Anaximandros，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Pythagoras，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Xenophanes，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Parmenides，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

141 嚴復譯，《天演論》，頁 55-57。

14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30-31。

國之孔子。此外則伊壁鳩魯生周顯二十七年，芝諾生周顯三年，倡斯多葛學，而以阿塞西烈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終焉。蓋至是希學支流亦稍涸矣。嘗謂西人之於學也，貴獨獲創知，而述古籍轍者不甚重。獨有周上下三百八十年之間，創知作者，迭出相雄長，其持論思理，範圍後世，至於今二千年不衰。而當其時一經兩海，崇山大漠，舟車不通，則又不可以尋常風氣論也。嗚呼，豈獨然哉！世有能言其故者，雖在萬哩，不佞將裹糧挾贄從之矣。	額拉吉來圖Herakleitos，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Demokritos，倡阿屯論（即莫破質點之說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Sokrates，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Plato，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Antisthune，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Zenor，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Epikuros，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Arkesilaos，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學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淆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附錄三：〈梁啟超承襲章炳麟述說的對照〉

梁啓超的論說	章炳麟的論說
王仲任頗思爲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爲近矣。……[143]	華言積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變其術，……作爲《論衡》，……然善爲蠭芒摧陷，而無樞要足以持守，斯所謂煩瑣哲學者。……[144]
皖派開祖曰戴東原震。東原生休寧，章炳麟氏謂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核而無蘊藉，蓋地理感化使然也。……[145]	……戴震起休寧，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溫藉，不便文士。……[146]
乃者餘杭章氏極推習齋，以爲荀卿以後一人，其言或太過，然要之爲一代大儒必矣。……[147]	……雖然，自荀卿而後，顏氏則可謂大儒矣。……[148]
吳、皖派別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章氏謂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爲異，諒也。……[149]	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150]
餘杭章氏謂齊、魯、韓、歐陽、大小夏侯各有師法，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師法略例，一切混合，殊無條理。云云。是誠中魏氏之失。……[151]	道光末，邵陽魏源，夸誕好言經世……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爲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略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

14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52。

144 章炳麟，〈學變第八〉，《訄書（重訂本）》，頁 146-147；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重訂本》，以下不再重覆。

145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92。

146 章炳麟，〈清儒第十二〉，《訄書（重訂本）》，頁 159-160。

147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83。

148 章炳麟，〈顏學第十一〉，《訄書（重訂本）》，頁 155。

149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94。

150 章炳麟，〈清儒第十二〉，《訄書（重訂本）》，頁 158。

151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97。

	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掍合之，所不能通，即歸之古文，尤越亂無條理。……[152]
習齋專標忍嗜欲、苦筋力之旨，爲學道不二法門。近世餘杭章氏以比諸羅馬之斯多噶派，諒矣。……[153]	【出處尚不詳】[154]

152 章炳麟，〈清儒第十二〉，《訄書（重訂本）》，頁160-161。

153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81；又，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仍稱顏元之學「有類羅馬之『斯多噶派』」。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35。

154 按，梁啓超此論，原來見諸《新民叢報》，號53（1904年9月24日），頁51；筆者遍查章炳麟1904年以前著述，未可得見章氏有此論，惟《訄書（重訂本）》收有〈顏學第十一〉一篇，嘗謂：顏元「形性內剛，孚尹旁達，體駿駔而志齊肅，三代之英，羅馬之彥，不遠矣。」（章炳麟，《訄書（重訂本）》，頁153）揆諸史事，自1898年「戊戌政變」後，梁啓超流亡日本，章炳麟亦於1899年往日本一行，雙方在橫濱相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頁77），此後章炳麟行蹤飄忽，往來中國、日本和台灣之間，與梁啓超仍有往還，1902年2月22日，章炳麟又有日本之行，猶與梁啓超往還，並有文稿見諸《新民叢報》，「以供旅費」，同年7月，章炳麟返中國，與梁仍通書翰（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頁130-131、135、139-140）。因此，梁啓超此論，或許是與章炳麟相見（或書翰往返）時自彼處聞知者？史料有闕，無可確證。

徵引書目

一、梁啟超著述

《新民叢報》。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影印初版）。

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3（台 9 版）。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台 2 版）。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之七。

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台 10 版）。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台 11 版）。

梁啓超，《儒家哲學》，收入《飲冰室專集（四）》。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台 3 版）。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收入《民國叢書》，第 1 編，冊 6。上海：上海書店，1989。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蓬萊閣叢書》本）。

二、專書

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丘爲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哲學・心理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吳天任編，《民國梁任公先生啓超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上海：世界書局，1934。

易新鼎，《梁啓超和中國學術思想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胡　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古代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再版）。

胡　適，《胡適留學日記》，冊 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台 5 版）。

胡　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台 5 版）。

胡　適，《四十自述》，《胡適作品集》，冊 1。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5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狹間直樹編，《梁啓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2 版）；1964（初版）。

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訄書・初刻本・重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麻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增訂8版）。

楊思信，《文化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嚴譯名著叢刊」本。

劉師培、林獬，《中國民約精義》，收入劉師培著，《劉申叔先生遺書》，「中華民國廿三年寧武南氏校印廿五年印成」本；本文引用的版本是《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景印），1997。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鄭匡民，《梁啓超啓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寶善齋編纂，《最新經世文編》，130卷，「光緒壬寅〔廿八(1902)〕嘉平月上海寶善齋石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景印本（12冊）。

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2005。

Befu, Harumi,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Berger, Stefan et al.,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

Chang, Hao.（張灝）*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scobar, Arturo.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Fogel, Joshua A.,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Hooson, David,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

Hsiau, A-Chin.（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Huang, Philip C.（黃宗智）*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Hutchinson, Joh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Gaelic Revival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Jaspers, Karl.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Michael Bulloc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Kosaku, Yoshino.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A Sociological Enqui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Kwok, D. W. Y.（郭穎頤）*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nd edition).

Lewis, Martin W.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Mondal, Anshuman A.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India and Egyp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O'Hagan, Jacinta. *Conceptualizing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pengler to Sai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rakash, Gyan.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Richter, M.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ang, Xiaobing.（唐小兵）*Global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nika, Sarkar. *Hindu Wife, Hindu Nation: Community, Religio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C. Hurst, 2001.

Verhoeven, W. M., ed. *Revolutionary Histories: Transatlantic Cultural Nationalism, 1775-1815.* New York: Palgrave, 2002.

三、論文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原刊《新潮》，卷 1 號 5，1919 年 5 月；收入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劉季倫、薛化元、潘光哲編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⑤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爲例〉，《二十一世紀》，期 45，1998 年 2 月，頁 47-54。

王東杰，〈《國粹學報》與「古學復興」〉，《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頁 102-112。

江心力，〈梁啓超「絀荀申孟」的荀學研究析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2 期，頁 47-51。

江勇振，〈期待另一個研究梁啓超的新方向〉，原刊《〔師大〕歷史學報》，期 2，1974 年 2 月；收入史華慈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余英時，〈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收入氏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李長林，〈歐洲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28，1997 年 12 月，頁 1-77。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2000 年 6 月，頁 77-158。

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期 3，2002 年 12 月，頁 49-119。

汪榮祖，〈梁啓超新史學試論〉，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冊 2。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

金七十論學者，〈周末學術餘議〉，《新民叢報》，號 6，1902 年 4 月 22 日，頁 113-120。

胡　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收入氏著，《胡適文存》，卷 4。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

夏曉虹，〈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讀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天津社會科學》，2001 年第 5 期，頁 119-125。

桑　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收入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馬君武，〈新學術與群治之關係〉，原刊《政法學報》，癸卯年(1903)期 3、期 7、期 8 連載；收入莫世祥編，《馬君武集(1900-1919)》。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崔志海，〈梁啓超與日本：學術回顧與展望〉，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張　灝，〈世界人文傳統中的軸心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許倬雲，〈附錄：論雅斯培的樞軸時代的背景〉，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以「引經據典」爲中心〉，《文學評論》，2001 年第 4 期，頁 23-32。

陳平原，〈精心結構與「明白清楚」——胡適述學文體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8，2002 年 12 月，頁 153-184。

陳平原，〈「元氣淋漓」與「絕大文字」——梁啓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古今論衡》，期 9，2003 年 6 月，頁 3-22。

陳其泰、安靜波，〈20 世紀初梁啓超對中國學術思想演進的宏觀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4 期，頁 54-60。

陳祖武，〈梁啓超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收入氏著，《清初學術思辯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章炳麟，〈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收入氏著，《章太炎全集》，冊 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傅斯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語〉，原刊《新潮》，卷 1 號 5，1919 年 5 月；收入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劉季倫、薛化元、潘光哲編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⑤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黃克武，〈梁啓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爲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6，1996 年 12 月，頁 41-90。

黃克武，〈梁啓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0，1998 年 12 月，頁 101-148。

黃克武，〈梁啓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181-213。

黃敏蘭，〈梁啓超《新史學》的真實意義及歷史學的誤解〉，《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219-235。

黃進興，〈韋伯論中國的宗教：一個「比較研究」的典範〉，收入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收入氏著，《聖賢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楊思信，〈拉克伯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及其在近代中國的反響〉，《中華文化論壇》，2003 年第 2 期，頁 141-146。

翟志成，〈師不必賢於弟子——論胡適和馮友蘭的兩本中國哲學史〉，《新史學》，卷 15 期 3，2004 年 9 月，頁 101-145。

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收入氏著，《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初刊《國粹學報》，期 2、期 6 至期 7、期 9（1905 年 3 月 25 日至 10 月 18 日）；收入李妙根編，《劉師培論學論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劉桂生，〈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及其成因〉，收入氏著，《劉桂生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潘光哲，〈「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胡適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文史哲學報》，期 56，2002 年 5 月，頁 109-143。

潘光哲，〈追尋晚清中國「民主想像」的軌跡〉，收入劉青峰、岑國良主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研討會論文集（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卷 16 期 3，2005 年 9 月，頁 137-170。

蔣　俊，〈梁啓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理論》〉，《文史哲》，1993 年第 5 期，頁 28-32。

鄭師渠，〈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收入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鄧　實（順德鄧實），〈論政治思想（一名政藝通報發行之趣意）〉，收入《光緒癸卯政藝叢書》，

〈政學文編〉，卷 1；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鄧實輯，《光緒癸卯（廿九[1903]年）政藝叢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28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總號 271。

賴瓊、李巧玲，〈從《辨康有爲政見書》看黃世仲的政治思想〉，《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第 1 期，頁 95-98。

錢玄同，〈序〉，收入劉師培著，《劉申叔先生遺書》。

錢基博（金匱錢基博），〈中國輿地大勢論〉，《新民叢報》，號 64（1905 年 3 月 6 日）～號 67（1905 年 4 月 19 日）。

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範轉移〉，《歷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168-174。

羅志田，〈中國的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收入氏著，《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

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收入氏著，《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

羅志田，〈溫故知新：民間的古學復興與官方的存古學堂〉，收入氏著，《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Chartier, Roger. "The Saint-Malo-Geneva Line." In Pierre Nora, ed.,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Vol. 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mpsther-Monk, Iain. "Speech Acts, Languages or Conceptual History?"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istory of Concept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Hill, Christopher L. "National Histories and Word Systems: Writing Japa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Q. Edward Wang, Georg G. Iggers, ed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Hutchinson, John. "Re-Interpreting Cultural Natio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45: 3, 1999, pp. 392-407.

Ishikawa, Yoshihiro.（石川禎浩）"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and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Renan, Ernest. "What is a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London: Routledge, 1990.

Rodgers, Daniel T. "Exceptionalism." In Anthony Molho and Gordon S. Wood, eds., *Imagined Histories: American 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Smith, Woodruff D. "Volksgeist." 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ed.,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5.

Tuck, Richard.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reating the "Volksgeist" of China: Rethinking Liang Qichao's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his *Lu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bianqian zhi dashi* (On the Basic Tren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hange)

Pan Kuang-ch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Liang Qichao's (1873-1929) *Lu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bianqian zhi dashi* (On the Basic Tren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hange), which was written between 1902 and 1904, created a new Chinese "Volksgeist." Liang's essay should be examined 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early 1900s China. Liang'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cluded the insights of scholars like Yan Fu (1854-1921) and Zhang Binglin (1868-1936), which aided his formulation of observa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This article shows how Liang constructed a "Volksgeist" of China based 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trends in Chinese thought. Discussion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annot neglect Liang's essay.

Keywords: Liang Qichao, *Lu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bianqian zhi dashi* (On the basic tren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hange), cultural nationalism, "Volksgeist," modern China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